

赤道人忆旧

父亲坎坷的一生 (一)



父亲黄振茂遗像
(1905-1964年)

父亲黄振茂，书名黄诗群，生于1905年农历二月初二。父亲幼年时在坤甸振强学校读书，小学毕业后到厦门集美学校升学，初中还没毕业就回坤甸帮爷爷打理生意。上个世纪30年代初，爷爷生意败落，父亲便到同乡黄业纯的“合丰兄弟有限公司”属下的“广顺木材厂”当职工，工资很低，仅够维持生活。父亲经常被派去卡江上游（当地人称“头顶”）采购木材和其他土特产；有时还要随船押运货物到爪哇、新加坡等外岛，在家的时间很少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军队占领坤甸，我们举家逃难到乡下，父亲才常在家里。战乱中的“天伦之乐”，让我们体会到父亲的关爱和温暖；他和母亲一样慈祥和蔼，一样痛爱和呵护我们。白天，我

们常跟父亲划着小独木舟到马来人的甘榜（村落）和达雅人的寨子买山货，或在屋后的荒地上开荒种木薯、苞米等。晚上，母亲在油灯下缝补衣服，父亲坐在床沿给我们讲故事。他既讲三国、水浒、薛仁贵征东，又讲《一千零一夜》的阿里巴巴。有时还津津有味地讲他到“头顶”和爪哇等地的轶事奇遇，我们都听得很入神。

父亲为人忠厚老实，与世无争，但他命运多舛，一生坎坷，屡遇险境。日本侵略军占领坤甸初期，一次，他去市内

购物，途中被日军抓去“勤劳奉士”——修机场。在押送去机场的路上，他趁夜色昏暗，押送的“兵补”（印尼伪军士兵）警戒松懈的片刻，同几位被抓的华人潜逃到茂密的丛林里，在荒山僻野躲藏了两天才回家，避过了劫难。当年很多被抓去“勤劳奉士”的人，不是在修完机场后，被活埋在附近的万人坑，便是被送去缅甸修公路，死于异国他乡。

又有一次，父亲到坤甸探望朋友，刚下轮渡，便见码头一群人在看日军张贴的通缉令，他上前一看，不禁冒出一身冷汗。通缉令大字写着：“通缉敌谍黄诗群”。那位在船码头等候父亲的朋友，二话没说拉着他便走。父亲一向与世无争，为人低调，从未参与政治活动，如何又成为日军的“敌谍”呢？原来他当年在厦门集美学校的一位同学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国民党军队，前不久被盟军派来太

平洋战区，在空投新加坡时被日军俘获，此人供出准备来坤甸找黄诗群开展抗日活动。因此，父亲便成了日本占领军通缉的“敌谍”。好在“黄诗群”是父亲回国读书时用的“书名”。他的出生纸、居民证用的都是“黄振茂”之名；在坤甸，除了同乡和旧日同学，知道“黄诗群”是父亲的人不多。日军难于追踪到“黄诗群”的下落，父亲又逃过了一劫。

二战结束后，我们家复员回到坤甸，父亲原来工作的工厂在日军南侵时毁于荷兰殖民当局的焦土政策，父亲失业了，我们家境极其困难。这时，父亲一位朋友陈先生，经营贸易生意开始发迹，当起大老板，他要父亲帮他押运货船去印尼独立军控制区，那里物资匮乏，可以攒大钱。头两次还算顺利，老板赚了不少钱，父亲也分到了红利。但以后几次就不那么风顺顺水了，还险些赔了老命。一次，他从苏门

答腊岛的巨港押运货物回坤甸，途中遭遇大风巨浪，小机帆船倾覆沉没，他和船员抓住海面漂浮的木头，在海上漂游了几个钟头，才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小岛登岸；第二天，幸好遇到一艘大货轮经过这里，才获救回到坤甸。

1946年5月，父亲押送一批粮食和日用品到南加里曼丹的红白区（印尼独立军控制区），因是小机帆船，不敢走大海，便沿着海岸边行驶，快到目的地时海水退潮，船老大一时疏忽导致船体搁浅。此时，从岸上冲来一股游击队，不由分说连船带货全部没收，并诬称父亲等人为荷兰间谍，将他们五花大绑投入地牢。在3个多月囚禁期间，父亲等人每天被迫在烈日下参加修建防御工事等重体力劳动；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，在印尼红白国旗下罚站一小时，诵念印尼“独立宣言”，以示拥护和效忠印尼共和国政府。



建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的振强学校是一所
有爱国光荣传统的华侨学校。



从左到右：图1：父亲回国时的照片；图2：
父亲回国的护照；图3：广州黄陂的住宅